

中国经济学 70 年：回顾与展望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笔谈(上)

编者按：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为了系统地总结和提炼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本刊特邀多位著名经济学家撰写了这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谢伏瞻

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既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探索的光辉结晶。这里仅就政府与市场关系谈一点感受和认识。

一、政府与市场：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探索

“放任”与“统制”，构成政府与市场关系完整谱系的两极。从斯密“守夜人”式小政府，到“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父爱主义”大政府，人类沿着这一谱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历史钟摆也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在这个谱系上来回运动。

在思想谱系的一极，秉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机制是调节经济运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只要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干预。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处理那些市场无法做好，但对社会而言又不可或缺的事情。斯密的“守夜人”政府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在思想谱系的另一极，赞同中央计划经济的学者则认为，市场机制在公平和效率两方面都存在严重弊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危机频发。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应当取代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以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全民的根本利益。传统计划经济学派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

处在思想谱系两极之间，则是更加丰富多彩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虽不认同政府越小越好，但仍信奉新古典教条，相信市场机制可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弗里德曼和科斯的观点比较典型。弗里德曼认为应把政府定位为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只要清晰且公平的市场规则得以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将有效配置资源，直至实现帕累托最优。科斯和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强调政府主要职责应集中于界定和保护产权；因为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交易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所在。

第二类，高度重视市场失灵现象，强调政府必须要在经济运行中有所作为。在经历了大萧条之

* 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邮政编码：100732。

垒”谈判日益增多；但丹尼·罗德里克给出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形”——超级全球化、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三无”的困难；^①基于合作、互惠、协商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正在受到侵害，多边主义贸易体系正在受到严重挑战，WTO的效率和权威性受到极大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势力正在增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期间，二十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美国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居全球首位，相比而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②尤其是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正在打破基于高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这将对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全球化“大变局”对未来30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会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要在坚决维护多边主义治理机制前提下，^③使未来工业化战略能够把握和适应这种全球化“大变局”。

第三，实现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以“后发赶超”为战略导向的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是高速工业化，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未来30年中国工业化也面临着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的艰巨任务和挑战。中国的高速工业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区域工业化不平衡，一些区域的工业化水平不充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产业发展的结构不平衡，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低水平产能过剩与高端产业、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的供给侧结构问题突出，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等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不充分，经济呈现“脱实向虚”趋势；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13亿人口大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给资源环境的承载提出了极大挑战；^④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与城镇化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还不充分，不利于工业化进程推进对“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支撑作用的发挥。面对工业化发展的这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有推动工业化战略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才能够真正全面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百年目标。高质量工业化，体现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需要、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基本特征。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应该重点满足三方面要求：一是满足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的要求；二是满足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化要求；三是满足与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的要求。

从70年发展看中国改革开放*

田国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回顾70年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当前重大变局的世界变化，下一步应该何去何从？近些年笔者归纳总结了“三维六性”的研究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论，无论是做管理还

*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4。

① 丹尼·罗德里克，2018：《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中译本，中信出版社。

② 渠慎宁、杨丹辉，2018：《美国对华关税制裁及对美在华投资企业的影响》，《国际贸易》第11期。

③ 谢伏瞻，2019：《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经济研究》第7期。

④ 黄群慧，2017：《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人民日报》，11月26日。

是搞改革、做研究都适用,那就是只有通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才能保证其结论和举措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这六性。

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呢?是因为笔者感觉目前许多对改革经验的总结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及历史视野的经验教训比较分析,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改革举措也是如此。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谈改革。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改革?所谓改革就是改正制度,把错的、落后的制度改成对的、先进的制度,给外界以希望。无论做什么,要搞清楚真正的逻辑起点。本文主要谈的问题是:到底是哪些因素,特别是新的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或者说近180年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并且在当前世界重大变局下也必须如此应对。

一、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与市场制度优势

做任何事情、分析解决问题,必须明道,也就是明了做事的基本规律、道理和原则,包括改革。经济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改革容易引起这么多争议,是不少人未将两大最基本而差不多又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第一是个体逐利性:在通常的情况下个体基本上是考虑自身利益的。比如,中国有中国的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企业有企业的利益,个人有个人的利益,这个实际上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性假设和讨论问题的逻辑出发点。如果个体总是利他,思想境界都很高,事情就好办得多,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机制设计或党纪国法。第二是信息不对称: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往往信息分散、不对称。但弄清基本情况,又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条件。承不承认、能不能应对好这两个最大客观现实约束条件,是避免争论或导致制度或政策失败,制定出好的制度,不断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的关键所在。于是,如何应对这两个最大客观现实,采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是经济学最关心的核心问题。

这样,制度的选择或制定由此就显得至关重要,但制度的制定并不是要改变人性,人性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个体的逐利性,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是基本改变不了的。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制度呢?实质是把人性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来设计游戏规则,以此顺应人性,让人们自愿地改变其行为结果,以此实行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也就是我们讲的激励机制。个体的逐利性和信息不对称这两个客观约束现实条件是没有国界的,没有特殊国情,可以说是普适的,存在于任何国家,由此所采用的基本经济体制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比如采用市场制度,中国也不例外,其实践说明了此点。

我们可以看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忽视了这两大客观因素条件。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认计划经济时期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中政府主导毫无疑问起到了重要,但能不能把它推到一个极致呢?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两个客观条件。

由于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这两大客观现实,在考虑经济问题、制定政策和制度时就需要注重三个异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信息有效性,尽可能用到少的信息。由于信息分散,非完全及不对称,人们才希望采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制度,进行松绑放权的改革,以此提高信息效率。二是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个体能否做好某件事情,关键看是否搞对激励。是否形成激励相容关键则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好坏,邓小平同志总结得异常到位:“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①三是资源配置有效性,在资源给定的情形下,没有再改进的余地了。资源配置是否有效,与激励和信息有关,一个低效的制度机制常常与激励不相容、信息成本过大是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制度在解决这三个要求方面具有天然、独特优势。

^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二、从控制实验的科学本质内涵看改革开放成功的差异因素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总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如此巨大成就的经验呢？中国过去 40 余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应对这两个客观约束条件，也就是个体的逐利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呢？当然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党的领导，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是党的领导，这不是新的因素。国有企业主导是不是导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新的因素呢？也不是。改革开放前后，国有制主导作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前，国企的主导作用更大。国有企业占据的比重更大，政府主导是新的因素吗？更不是，政府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中是无处不在，十分显著的，而改革开放后，其干预经济的程度大大减少。那么，为什么后 40 年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那就是在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外，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这些新的因素毫无疑问地就是较大程度上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对外开放的实行，民营经济的巨大发展，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笔者认为，科学的本质内涵就是可控的实验。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时，也应按照科学的本质内涵——控制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不能把所有的因素都放在一起泛泛而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的前后几十年对比，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控制实验。因为很多重要的、必要的因素：党的领导、政府的主导和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建国 70 年来所一直贯彻和保持的。但是为什么在这后 40 年，中国取得的发展和进步能如此巨大呢？关键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也就是经济的民营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的一些根本举措，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样的客观现实，依然是解决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应对方向的基本逻辑出发点。

三、世界变局下的中国进一步的继续改革开放

无论是从内部发展需要，还是从外部竞争应对来讲，中国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特别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美竞争很有可能将是长期性的，其冲突性和对抗性呈现增强趋势。因此，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

中国经济要在未来 30 年，实现更高质量的良性平衡充分发展，应结合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宏伟愿景目标，戒骄戒躁、求真务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是在面对和处理中美经济贸易摩擦的问题上更要有战略定力、冷静思考、有效沟通，摒弃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特别要避免意识形态化和滑向全面冷战式的对抗。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期望，如果对方一定要跟你斗，我们也不能不还手。但是，能不能避免冷战式的这样最坏情况出现？要靠两国领导人的智慧，也要靠两国企业的利益纽带与两国人民的情感联结。

面向未来，对外我们对自身要有客观清醒的认知，不能盲目乐观、夜郎自大，韬光养晦的方针不能放弃，应寻求与能力相一致匹配的对外战略目标，不能模糊化和无限化，引起国外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对内应抓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推进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这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九大提出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层面实施更大力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制性的改革。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特别是一些竞争性行业，起到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发挥社会自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有可能让中国的国力超越美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冀 木）（校对：金 山）